

惜

44.618

Y X

3.9

醇

之

504851

卷

情

第三版

当代杂文选粹

第三辑

惜 醇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 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三辑)

惜 爵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 插页：2

字数：65,000 印数：1—3,450

ISBN 7—5404—0344—6

I·272 定价：1.40元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I
有趣的巧合	1
时髦与禁忌	6
人性与兽性	10
悲愤之余	14
并非当务之急	
——也说“教师节”	19
读《死》随想	22
夜记一则	30
说长道短	34
德与才	
——看画随想	37
“羊走钢丝”的联想	40
要有解放全人类的博大胸怀	
——也谈“打天下”和“坐天下”	45
“省力”与“无知”	49
涸辙·江湖·鱼缸	52
冷板凳和热心人	56
“挂靠”的联想	59
尾巴的联想	63

“文人相轻”及其他	65
“以失败告终”	68
论“费厄泼赖”应该免行	70
不屑·不会·不配	72
玩笑当正经	74
不合时宜的称道	76
也说杂文的“忌”	78
活着的“阿Q时代”	81
名实之间	

——也说杂文的地位及其是否算文学	84
------------------------	----

废话妙用

——也说“严肃处理”	87
器的鼠化与神化	90
千里马与癞蛤蟆之间	91
屈原的魅力	94
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97
时常想到的一些往事	99
“狗咬人”与“人咬狗”	103
也说“鲁迅式”与“新基调”	105
由“过关”想到“把关”	108
在冷眼和热心的背后	112
“竖子”何以成名	116
“知名度”与“透明度”	119
编者后记	123

有趣的“巧合”

《河北文艺》六月号在显著位置发表的《“歌德”与“缺德”》一文，斥责敢于正视现实的作家是“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并且武断地提出这样一个公式：非“歌德”即“缺德”！差不多与此同时，《青海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真实与艺术》一文，借三个画师为国王画像的故事，鼓吹艺术要善于巧妙地把丑恶事物伪装起来。从字面来看，这两篇文章似乎是不相干的，然而读者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内在联系：前者是以文坛霸主的口吻命令人们必须“歌德”，后者则是以艺苑导师的姿态为人们规定“歌德”的原则和提供“歌德”的样板。

两篇文章都教人粉饰现实，但方式又有所不同。《“歌德”与“缺德”》是睁眼说瞎话，把林彪、“四人帮”肆虐十年之后的中国描绘成“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的世外桃源。这种“歌德”的手段未免有点拙劣，就象“三个画师”中的头一个那样，硬把左眼斜、右腿短的国王画成了美男子。而《真实与艺术》一文所称道的第三个画师则

比这高明多了，左眼斜就让他瞄准，右腿短就让他登石，在画师精心安排的这一“典型环境”中，“假恶丑”顿时变成了“真善美”，妙哉！可见，《真实与艺术》一文是对《“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十分必要的补充。这一补充之所以十分必要，就是因为它给“歌德派”大师们提供了“着实应当认真记取”的“教训”，启示他们学会粉饰和遮掩的巧妙本领。——这样才可以避免杀身之祸，又可以博得主子的赞赏，从而飞黄腾达。所以，我觉得两篇文章差不多同时问世，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这里用了“歌德派”一词，可能又要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其实，只要对近二十余年的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一称号并不是攻击者强加于某些人的，相反却是某些人自诩的。我们从不笼统地反对“歌德”，当然也不笼统地提倡“歌德”。歌颂与暴露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在创作实践中往往是兼而有之，或者交替使用，很难找到“纯歌颂”或“纯暴露”的作品，试想，对“真善美”的歌颂，本身不就意味着对“假恶丑”的暴露吗？这里，根本问题是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的作家，总有个起码的是非标准，绝不会把功德当罪孽来暴露，也不会把罪孽当功德来歌颂。现在的问题是，某些自诩“歌德派”的人却偏偏强迫人们把罪孽当功德来歌颂，把阴暗当光明来歌颂，把“假恶丑”当

“真善美”来歌颂。对此结论，《“歌德”与“缺德”》的作者大概不会讳言的，因为他的大作中已公开表明了这一点；而《真实与艺术》一文的作者却可能感到委屈：怎能以生理缺陷来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呢？诚然，任何比喻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没必要去钻牛角尖，追究故事中的国王是否值得歌颂。如果他确实功盖天下，斜眼跛足也无损于他的光辉形象；如果他确实恶贯满盈，斜眼跛足也不足以揭示他的丑恶灵魂。就事情本身来说，生理缺陷确实是无足轻重的。然而作者把斜眼跛足专门拿来评论，用来探讨“艺术的规律”问题，那就显然是把它作为某种丑恶事物（或者事物的某种丑恶属性）的象征；否则，援引这个故事也就毫无意义了。既然如此，文章的主题若不是鼓吹以假乱真、以恶充善、以丑冒美，又是什么呢？如果这就是“歌德派”的创作原则和样板，那我甘愿做“缺德派”！

自诩“歌德派”的人，情况也不尽相同。有人专事吹拍，谁在台上就“歌”谁之“德”，在他们眼里，有权就有德，权大德就多。这种人是极少数，我们不去提他，免得污了我们的笔。比较多的人是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看问题绝对化，既然社会主义好，那就只能歌颂其光明，于是“歌德”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唯一使命了。其实，不只社会主义社会有阴暗面，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有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和斗争，如果真的“止于至善”，人类社会不就成了——潭死水吗？多年来，“暴露”一词只能用在敌我范围内，而在人民内部则成了一种禁忌，这正是“形而上学猖獗”的结果。既然人民内部也有缺点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有旧社会的痕迹，而且我们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暴露思想”、“暴露问题”、“暴露缺点”一类的词语，为什么文学艺术领域就不许把“暴露”一词用在人民内部呢？其实，人民内部很多丑恶的事物正是敌人残害的结果或是腐朽事物的流毒，如阿Q的愚昧、孔乙己的迂腐正是封建制度罪恶的铁证，我们暴露这些东西，不正是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鞭挞吗？即使是人民自身的弱点，暴露出来也有好处，只要立场对头，它就能使人警醒，使人感奋，从而在斗争中克服这些弱点。无私才能无畏，无产阶级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有足够的勇气正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弱点；相反，不敢正视自身弱点的人就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党勇于把张志新冤案的真相揭露出来，正是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体现。张志新同志被残害的事实，暴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暴露了我们一些同志在政治上的愚昧庸俗。事实本身已把问题暴露得够充分了，我们的作品为什么要回避呢？须知，掩饰自身弱点的作品未必伟

大，勇于暴露自身弱点的作品未必渺小！另外，还有一些同志出于受迫害者的变态心理，不管真佛假佛，只要见菩萨就磕头，仿佛这样做就能确保平安。暴露，会有“恶攻”之嫌；歌颂，总不会有什么差错吧？其实不然。老舍先生曾是一位虔诚的“歌德派”，但后来还是惨死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魔掌。血的教训，还不能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些吗？

《“歌德”与“缺德”》和《真实与艺术》两篇文章差不多同时问世，可以说是“巧合”，但“必然”总是寓于“偶然”之中的。所以捧读之余，不免把这事与今年春天那股否定三中全会正确方针的冷风联系起来。虽然这股冷风仅仅能“吹皱一池春水”，并不能阻挡春天的脚步，但它与时代的潮流太不谐调了，所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1979年8月7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号《青海湖》）

时髦与禁忌

今年春节，首都的服装商店展销了一批新式服装；与此同时，被禁锢十多年的交际舞又回到了联欢和喜庆的场面之中。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既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值得欣喜若狂。可是，当国家通讯社和报刊报道此事之后，我们一些鼻子特灵的同志仿佛立即嗅到某种“新精神”的气味，于是“新的政治任务”也就来了，有人把跳舞作为共青团组织生活的内容，有人要开展“扫除舞盲”的运动，就象当年扫除文盲那样。在某些人心目中，穿喇叭裤、跳交际舞简直成了“思想解放”的标志，甚至成了实现“四化”的先决条件。谁知不到两三个月，一些鼻子特灵同志仿佛又嗅到了什么“新精神”的气味，于是大喊“煞住这股歪风”，似乎实现“四化”的阻力就是来自什么“奇装异服”之类，如果“四化”不能如期实现，就要拿这些穿喇叭裤、跳交际舞的人问罪。呜呼！顷刻之间，时髦就变成了禁忌！

其实，我这种感慨也是多此一举，因为我自己对“穿着细事”从来是漫不经心的。这不是说我天生不爱美，而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没有足

够的经济条件。况且，时髦服装象政治气候那样变化多端，紧赶慢赶还是要落在后边，索性也就不赶了。正象赶慢的钟表一样，如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走，总还是要落在正点的后边；还不如干脆停摆，这样，二十四小时内总有两个时辰是正点。当然，人们的精神状态并不都象我这样，但我想，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总不会整天研究裤腿的尺寸，连起码的温饱都难于保证（这当然是“四害”横行的后遗症）的人，更不会随着轻音乐翩跹起舞。因此，尽管再提倡，热心于此道者也只是少数（再多也只是一部分）人，多数人却还是“我行我素”。我不反对服装式样革新，也不反对娱乐活动。如果服装没有革新，恐怕我们如今还是“峨冠博带”——不，还是在披树叶、穿兽皮哩；如果连起码的娱乐都没有，人类也不可能有今日之文明。不过，无论是服装的式样还是娱乐的内容，都离不开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与此适应的精神面貌，离不开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同时也和一定的自然条件、劳动条件相联系。——这也有其内在的规律。如果硬要青海的牧民穿纱裙，南海的渔民穿老羊皮，都是行不通的；而且硬要全国上下、男女老少、各族各界都永远穿统一规格的“八大块”（青海方言对中山服的一种称呼），恐怕也是办不到的。可见，在穿衣方面还是以“无为而治”“各得其所”为好，这也正是

我“漫不经心”的原因之一。

但从另一方面说，我的感慨也并非无病呻吟。如果真能“各得其所”，当然也就天下太平，可是正如鲁迅所说，有些人偏偏要“以己律人”，于是世上就多事。就拿“煞住这股歪风”的口号来说，它就与我有直接关系。既然成了一种“风”，那就不是少数人的事，起码是相当多的人都在穿“奇装异服”，都沉醉于轻歌漫舞之中。尽管我没穿，没跳，但也难于逃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嫌疑。不然，“风”字从何谈起呢？其实，那些真正的“追求”者对“煞住”的口号是无动于衷的，而这一口号成为报纸的醒目标题，却只能吓唬我们这些并未“追求”的人。这一吓，就使我不得不思索：为什么时髦顿时变成禁忌？为什么“思想解放的先驱”顿时变成“复辟倒退的罪人”？为什么一些人不去探讨实现“四化”的真正阻力所在，却偏偏在“穿着细事”上大作文章？

记得鲁迅说过：“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我觉得这话今天还有现实意义。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爱走极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四年前大批“中庸之道”的运动虽不是根源所在，但它对“过激”思潮总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多年来，人们都爱说“矫枉必须过正”，这话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的，但被人歪曲得不成样子了。本来，“过正”是“矫枉”的手段，而后来却成了“矫枉”的目的，结果越“矫”越“枉”，越“枉”越“革命”。我们一些人也习惯于在“矫枉过正”的潮流中过日子，今天“誓死捍卫”，明天“彻底砸烂”，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都带有盲目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愚昧的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几千年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影响的产物。因此，我觉得“穿喇叭”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某些“吹喇叭”的人！

(1979年《雪莲》试刊号)

人性与兽性

鲁迅在谈起他“仇猫的原因”时说：“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朝花夕拾》第5页）看来，人和禽兽也有某些共性，因此某些人被称作“衣冠禽兽”是不足为奇的。但人毕竟是高等动物，其聪明才智不消说，其残忍程度也是一切禽兽猛兽所望尘莫及的。禽兽的残忍是本能的，而人的残忍却是自觉的；动物界的“弱肉强食”只发生在“种间”，而人世的“弱肉强食”则发生在“种内”。当科学技术被用于屠杀和刑讯时，人类的残忍更是发展到“现代化”的水平了。不过也应看到，与兽性“现代化”的同时，人性也在“现代化”。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刑罚是何等残酷，何等野蛮，古罗马的“奴隶角斗”在我们看来更是惨绝人寰。但这一切在当时不仅为法律所肯定，而且也为社会道德所认可。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残忍现象虽然仍以其他方式存在和发展，但已为明文的法律